争论中的世界秩序观与中国对外战略[1]

杨 筱

内容提要：关于世界秩序的不同构想及以此为基础的大国战略表述，近年在国内外知识界引起争论。本文梳理中国国内关于世界秩序的三种最具代表性的观念和政策路向，分析它们的不同特点和相关性，辨析不同世界秩序观的思想和实践来源。其实，适合中国国家目标和国际大势的世界秩序观和战略构想之成熟，是一个任重道远的动态过程，不仅要审时度势，明辨国际实力对比，而且要充分理解国际社会关于世界秩序的主流思想，才能是非分明，判断准确，中肯分析国际趋势，理性设计可行政策。此外，适合中国国情和国际趋势的21世纪大国战略，还需要普适性哲学和打通中西的政治学理论做支持，方能在国际社会赢得话语权和道义支持。

关键词：世界秩序 中国大战略 国际社会

关于世界秩序的不同观念最近在中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争论。

关于世界秩序的不同观念最近在中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争论。冷战结束之初西方对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的畅想，已被关于多极、无极或近似19—20世纪欧洲协调的若干国家

杨筱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及战争研究系“中国研究和国际关系大学讲师”（2011年9月到任），牛津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系博士后研究员，牛津大学中国领导力发展项目部副主任（2006—2011年），博士。

1 本文部分内容先后在2008年9月牛津大学－复旦大学“多边主义”国际会议、2010年11月柏林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Auswärtige Politik e.V.）组织的跨大西洋专家“世界秩序研讨会”上作为主题发言发表。特此感谢与会专家和学者，特别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Paul Haenle（韩磊）先生和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和社会科学系教授、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所 Eberhard Sandschneider 博士的评论。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于铁军博士耐心阅读了本文英文纲要并提出宝贵意见，特别致谢。

联盟的讨论所取代。[1]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在国际事务上——特别是国际规则的修改和制订方面——日趋活跃。现有国际制度如何管理新兴大国的崛起，以避免灾难性冲突，却是未解难题。新兴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权力博弈方式和价值立场分歧成为关注的焦点。无论是对“金砖五国”全球影响力的估计，还是有关“亚洲世纪”的预测，在甚嚣尘上的争论中，关于中国国际行为可能削弱西方利益的种种警惕和担忧无疑占据了重要篇幅。随着中国持续的快速经济增长和综合实力的不断上升，国际社会认为中国正在改变其对外战略，在国际事务特别是地区冲突中日益显示“强硬傲慢”态度，似乎正以此取代“韬光养晦”策略。[2]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其现在与未来的世界目标定位及其借以实现目标的战略路径，必然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世界秩序观。中国知识界不乏对世界秩序和中国国际地位的种种构想，但鲜见对世界秩序的完整理论表述。本文从各种关于中国战略地位和全球角色的政策表述、官方发言、学者论著和民间公开讨论中梳理出三类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分析它们的不同特点和相关性，辨析不同世界秩序观的思想和实践来源，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世界秩序观和中国对外战略需要考虑解决的几个基本问题。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其现在与未来的世界目标定位及其借以实现目标的战略路径，必然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世界秩序观。

第一类主张接受美国虽然实力衰减但仍为世界头号大国的事实，在力量此消彼长的多国角力过程中，积极展开大国外交和区域外交，力图有所作为；第二类打算挑战现有世界秩序，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即时转化为军力，并在国际舞台合纵连横，建立挑战美国的国家或地区联盟，抗衡美国，甚或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第三类考虑以传统哲学中不分彼此、浑然天成的一元天下观来替代以人权、自由和平等为旨归的二元世界秩序观，并以建立在中国传统伦理基础上的

1 Adam Roberts, "Variable Geometry –Who's In Charge of Today's Non-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The Journal of German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Fall 3, 2008, pp.13-19; 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8, pp.23-37; Andrew Hurrell, *On Global Order: Power, Value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Elizabeth Economy, "The End of the 'Peaceful Rise'?" *Foreign Affairs*, December 2010; Rosemary Foot and Andrew Walte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Global Ord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Wang Jisi, "China's Search for Grand Strategy: A Rising Great Power Finds its Way,"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1, pp.68-79.

2 Economy,*op.cit.*; Michael Swaine, "Perceptions of an Assertive China,"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32, 2010, pp. 1-19; David Pilling, "Poised for a Shift,"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26, 2010.

华夷等级秩序代替现有世界秩序。[1] 为讨论方便，本文把这三类观点分别简称为“现有秩序作为论”（作为论）、“挑战美国主导论”（挑战论）和“一元天下秩序观”（天下观）。[2]

现有秩序作为论：与中国对外政策相一致的国际秩序观

与国内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一致，中国领导人将国家对外政策目标概括为“和谐世界”。

与国内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一致，中国领导人将国家对外政策目标概括为“和谐世界”，顺经济全球化之势而为，坚持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通过积极倡导和实践多边外交，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实现和平、开放、合作、和谐和共赢。2005年9月1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第一次完整地将中国和平发展的最终目标表述为“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讲话指明“中国将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共同进步联系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将一如既往地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履行国际义务，同各国一道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简言之，“和谐世界”的对外战略是“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3] 2005年12月22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中国政府相信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和平的外部和内部环境，中国的和平发展会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4]

认同或支持和谐世界观和多边合作论者，或为政府官员，或为专家学者，或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对“和谐世界”的理解或者表述可能持不同意见，但深察经济全球化不可逆之势和世界相互依存加深之实，都希望中国的发展继续受益于对外开放，都关心如何确保中国继续从现存国际秩序中获益，因此支持政府接受现有世界秩序，并力求在目前国际体系之内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国家地

1 该分类只为方便本文讨论，既无意穷尽所有观点，也不求严密区别三类之间界限（三类观点部分内容可能交迭或近似。另外，本文讨论中忽略“世界秩序”和“国际秩序”的细微差别，视中文语境两相替用，但不用有“全球治理”含义的“全球秩序”概念来指涉现存国家间秩序，后者为仍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世界秩序。

2 部分讨论来自本人目前研究课题“Contending Conceptions of World Order and 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3 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9/16/content_3496858.htm。

4 2002年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勾勒了多边外交框架。见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http://www.cctv.com/news/china/20021117/100187_1.shtml。

缘安全战略目标，扩大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影响。他们中很多人还主张，即使中国经济和综合实力进一步壮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不能也不应该致力于挑战和改变全球秩序，寻求霸权或全球主导地位。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不能也不应该致力于挑战和改变全球秩序，寻求霸权或全球主导地位。

“作为论”的一部分支持者可能认为，现有世界秩序和中国领导人提倡的“和谐世界”具有密切的内在相关性，后者所描述的“和谐世界”目标是理想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国际秩序充分实现后的结果状态。他们中不少人在不同场合表达了与国际社会主流观点相同或相近的主张自由、平等、民主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的看法。但是，“和谐世界”的表述未能在西方政治家中引起共鸣，西方学术界倒是不乏对“和谐世界”的批评。一种批评指向“和谐”概念的模糊性，认为“和谐世界”的表述缺乏哲学和政治学理论支持，而且在国际关系实践上缺乏可操作性。这种观点认为，“和谐世界”的提法既可以支持将“现有世界秩序”理想化的良好愿望，也可以支持将“不同国家的体制或规则同质化”的大一统等级秩序主张。由于中国从文化、价值到政治体制都被西方看做“他者”，英美一些学者出于担心中国有意在国力进一步增强后，按中国文化价值迫使不同国家制度同质化，因而严辞反驳“和谐世界”论。[1]

随着中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渐趋多元化，持不同政治立场的学者和政策顾问也争相阐释“和谐世界”“理论”，或为“和谐世界”表述作注。相互矛盾和相互削弱的“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往往使得政府在自己创造的关键性政策话语面前几近失语。由此，关键性政策话语为政府国际政策行为辩护的能力也随之削弱。更不利的是，莫衷一是的阐释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的行为和领导人的运作空间，削弱了对外政策在国内外的感召力、合法性和执行效果。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中国出口，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要求也日益紧迫。这促使中国政府进一步调整策略，以应对国内可持续发展和平衡发展的严峻挑战。中国领导人和政治精英很快调整国家核心利益目标，以及与之配合的对外政策，要求外交工作“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服务”。[2] “现有秩序作为论”突破“和谐世界”目标和“韬光养晦”策略话语的束缚，被赋予更为具体和明确

---

1 参看 William Callahan, “Chinese Visions of World Order: Post-hegemonic or a New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November 2008, pp. 749-761; 关于和谐世界的另外解读，参看 Yongnian Zheng and Sow Keat Tok, “ ‘Harmonious Society’ and ‘Harmonious World’: China’s Policy Discourse Under Hu Jintao” , *Nottingham University China Policy Institute Briefing Series*, Issue 26, October 2007。笔者 2006 – 2010年间在伦敦、牛津、柏林、波士顿、纽约等地的学术访谈和交流中注意到，中国要以“和谐世界”论来与西方国家建立战略互信，难度相当大。

2 参见胡锦涛2009年7月在第11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出席第11次驻外使节会议》，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7/20/content_11740850_1.htm；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http://www.chinanews.com/gn/2010/12-07/2704984.shtml。

的内容。“和谐世界”固然应解释为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善意目标，但因其模糊含义则理应从大战略理论术语中隐去。不过，即使话语的细微调整也已引起外界对中国国际行为走向的诸多猜测。美国外交委员会一位研究人员2010年12月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短文，题为“‘和平崛起’的终结？”，在西方被众多媒体转载并在各种有关中国和新兴大国的讨论会上被反复引用。[1] 关于一个坚定自信（assertive）的中国是否威胁西方利益的讨论也在展开。[2]

面临国际社会对中国对外战略新表述的不解和担忧，中国知识界继续探寻更为清晰的认知框架和更为有力的理论支持，来解决国家在变动的世界秩序中如何重新定位、如何规范行为尺度的重大问题。王缉思教授在2011年初发表于美国《外交》杂志的文章中，即试图阐明中国大战略的核心目标和实现目标的策略路径。该文对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厘定和对外部压力的辨识、对“韬光养晦”策略效用的解析，以及对强国雄心的冷静认识及政策建言，固然是一家之言，却也进一步界定、充实和发挥了“作为论”。[3] 大战略理论家不难沿着现实主义路径来赋予国家核心利益以具体内容（安全、地缘、经济，等等），并设计相应策略路径（营造和平环境、透明发展军力、维护大国关系、实行区域多边主义、良治，等等）。但是，“现有秩序作为论”的主张者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中国国内安全和发展的现实目标，与一个其正当性建立在自由、人权、平等和民主理念基础上的联合国框架秩序之间，保持长期动态平衡。换言之，理论家很难将中国大战略的考量完全置于联合国框架下的价值理念和主流话语（如人道主义干预）之外。而在实践上，价值之争不仅增加利益考量的难度，容易成为国家间争议和不信任的缘由，而且价值本身还是利益考量的一个重要维度。除非完全囿于局部利益得失的算计或只讲实力政策（Realpolitik），仅为大战略长期效用计，或者仅为中国在国际上争取更大的话语权，“作为论”的支持者选择接受普适价值既顺应历史也符合逻辑。

如何在中国国内安全和发展的现实目标，与一个其正当性建立在自由、人权、平等和民主理念基础上的联合国框架秩序之间，保持长期动态平衡。

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融入现有秩序的程度当然不可能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在国际上赢得话语权，既要靠强大的国家综合实力，也要靠体系融贯的普适价值和政治哲学理论。而后者的建构还徘徊于近百年之前即已开启

1 Economy, *op.cit.*

2 Henry Kissinger, "China Displaying Assertive Behavior," Big Interview,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1, 2010; Swaine, *op. cit.*; Kerry Brown and Loh Su Hsing, "Trying to Read the New 'Assertive' China Right," *Chatham House Asia Programme Paper* 2011/02, January 2011; Thomas J. Christensen, "The Advantages of an Assertive China: Responding to Beijing's Abrasive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1.

3 Wang, *op. cit.*

的“中西之别，古今之异”的辨析过程中。由此，中国在动态的现有世界秩序中有所作为的空间之扩大，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领导人在外交功能型事务方面的智慧、技巧和策略。

挑战美国主导论：发展硬实力形成战略竞争

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在外交领域的施展空间比西方国家更容易受到限制，从而不利于充分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更难以将利益最大化。中国领导人常常需要多方考虑平衡各种力量而言行均受掣肘。本来这种情况也正常，国际关系毕竟不再是零和游戏，任何国家都必须既在联合国框架秩序中行事，也需要学会在大国关系的多重博弈中实现双赢。但是，似乎是中国的百年屈辱历史使得一些人感觉到作为新兴大国在现存秩序中受制的不服气，这促使一些学者和官员从有欠理性的另一路向探寻出路，这便是引起西方怀疑、紧张和警惕的挑战美国的主张。

“挑战论”的支持者或有军方背景，或持有保守的民族主义立场，或崇尚实力政策。他们的观点常在英美学界和媒体一石激起千重浪，引发对中国发展的种种猜测和忧惧。其中刘明福、罗援和王晓东的言论和著述尤其如此。例如，国防大学刘明福大校在其专著《中国梦》中主张中国应该建立世界最强大的军力，认为“中国21世纪的大目标”是与美国竞争，“成为世界第一，做头号强国”。该书旁征博引，叙述层层铺开，力图论证美国已经衰落、中国将要取而代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1] 其观点迎合社会一小部分人的狭隘民族利益观和大国心态，很容易在一些人中间引起“洗雪百年国耻，从此扬眉吐气”的共鸣。《中国梦》一书虽然致力于建构所谓后美国时代大国战略，却视国际政治为大国角力的零和游戏，一方面误判国际国内形势，夸大中国实力，盲目赋予中国救世使命，另一方面不顾大战略考量的基本原则，以战术眼光取代“战略”考量，不仅错置国家核心利益目标，更让政治外交在其所谓“大战略”中缺位。殊不知，国家大战略考量，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一失足成千古恨；恰如一位美国学界同仁指出，“挑战论”未免失诸“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2]

“挑战论”既忽略美国虽然实力下降（并不断遭到国际社会各种批评）却仍然是这个秩序最有力主导的事实，也看不见西方一系列核心价值在支持现有世界秩序中的重要作用。“挑战论”支持者应该明白，从军事、价值到经济上全面挑战美国，无异于与西方为敌，甚至向整个西方宣战。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假若选择这样的所谓“大国战略”，无疑比自杀更具灾难性。有评论者担心，“书生论政”

1 刘明福：《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版。

2 同上。

清谈空议所谓“大国战略”事小，部门狭隘利益事小，而给有意遏制中国发展的西方人士继续误解中国大战略、误导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依据，就是大事了。[1]所幸，2009—2010年国家重新确立的国家核心利益目标及实现策略远离了此类所谓“中国梦想”。

“挑战论”的主张显然与“和谐世界”目标和“韬光养晦”策略背道而驰。

“挑战论”的主张显然与“和谐世界”目标和“韬光养晦”策略背道而驰。其主张虽不足论，但其提出的语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种新的要求：一部分人认为有必要重新考量大战略的局部或战术层面。比如，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能源资源命脉不能断，有人主张中国海军实现“远海作战”的战略转移，以保护中国能源进口和巨额海上贸易。目前争论意见两端，分歧无法弥合。支持者中有人甚至建议中国海军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海外媒体近日频频引述复旦大学沈丁立教授的提法，似乎最具代表性：“我们无需回避在海外设立军事基地的想法……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蓝水海军，依靠海外军事基地降低补给成本。”反对者认为，中国在海外设立军事基地只会激起别国对中国崛起的反感，如北京大学朱锋教授称这是“自杀的念头”。[2]

“挑战论”提出的语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领导人面临国内要求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舞台话语权的压力。“如何转化？”这是一个难题。诉诸军力、倡导武力是一种转化，但古今中外史书上写满了盲目扩张和滥用武力导致国家和民族灾难的案例（显然这些灾难并非仅仅源于“具备军力”和“诉诸武力”之间的界限极难把握）。价值建构也是一种转化，却非短期可为，也非政府所能，但不能放弃。国家大战略唯有一方面致力于增强实力，并借助实力来充分发挥政治外交策略的作用，为进一步发展争取空间，此不失为短期至中期之“*Modus Vivendi*”；另一方面，借此“*Modus Vivendi*”执行理性切实的大战略时，也在国际社会创造空间，不断建立价值交叠（value overlap），以图实现中国和平发展，各国共赢。[3]

“天下”观：世界社会的一元等级秩序

中国国内要求以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支持中国获得国际话语权的情绪和呼声有高涨趋势。“作为论”和“挑战论”的支持者更多关注战略层面，集中思考

1 见薛理泰：“书生论政误尽苍生——评《中国梦》”，载《联合早报》，2010年4月29日。

2《金融时报》中文网，2011年1月24日，杰夫·代尔和马利德报道。

3 将国际关系和国家大战略作为 Modus Vivendi (近于“权宜之策”) 来建立国家之间的价值交叠，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以价值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这是罗尔斯在国际领域实现正义的基本想法 。参见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本文作者在课题“Contending Conceptions of World Order and 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中另行论述。

"*Modus Vivendi*" 和 "*Modus Operandi*"（近于"策略和手段"）的问题。而政治哲学和价值建构，虽为国家大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却未充分体现在前二者的考量中。知识界从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或厘清概念，或爬梳出有益于现代国际关系的元素并借此影响国家对外战略和世界秩序的塑造，这在过去近十年不乏先例。[1] 其中，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赵汀阳研究员以《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一书和数篇中英文论文重新解读"天下"概念。虽然作者只是把《天下体系》一书看做建构理论体系的第一步，但还是承认此书的目的也是"为世界贡献中国的知识体系"，"已经在舞台上了，就不能不说话"，这似乎反映了作者自觉的使命感和任务的紧迫感。作者认为，"当中国成为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就必须讨论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对于世界的意义。如果中国的知识体系不能参与世界的知识体系的建构而因此产生新的世界普遍知识体系……那么，即使有了巨大的经济规模，即使是个物质生产大国，还将仍然是个小国……中国要思考整个世界的问题，要对世界负责……中国的世界观就成了首当其冲的问题"。[2]

《天下体系》旨在论证"天下理论"是"任何可能的世界制度的形而上学"。

《天下体系》旨在论证"天下理论"是"任何可能的世界制度的形而上学"。该书的"天下观"试图整合三个层面的含义：一为地理学上的土地，或者人类居住的世界；二指居住在大地上的人们的心思，即民心，以此"得天下"不是征占土地，而是"得民心"；三是天下的政治学含义：世界一家的理想，及在此基础上建立世界制度和世界政府的追求。[3] "天下"理想的帝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接近康德想象的"世界共和国"和马克思的世界政治制度。"世界"，而非"国家"，才是思考问题的不可还原的尺度；而"以世界衡量世界"是"老子'以天下观天下'的现代版"。[4] 在拥有整个世界、天下一家的帝国里，照作者的提法，"天下为家而无外"，既然世界无外，它就只有内部而没有不可兼容的外部，也就只有内在结构上的远近亲疏关系"，缺乏清楚界定的"他者"、异端和民族主义。"于是，与本土不同的他乡只是陌生、遥远的或疏远的，但并非对立的、不可容忍的和需要征服的"。"对于天下，所有地方都是内部，所有地方之间的关系都以远近亲疏来界定，这样一种关系界定模式保证了世界的先验完整性，这可能是唯一能够满足世界文化生态标准的世界制度"。[5]

该书出版后，在法国、荷兰、英国、美国等国家知识界引起了一些积极回应，也受到严厉批驳。其在中国国内也有支持和反对者。批评者指出，该书将中

1 如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2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3 同上书，第40—42页。

4 同上书，第47页。

5 同上书，第51页。

国古代关于“无我的世界单位”（a selfless world unit）的一种思想简单化，仿佛遥想上古时代和平、有序而又富足仁厚的中央帝国，但是这样一个中国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一些西方批评者把《天下体系》解读为支持“在全球建立一个等级制度，其中秩序的价值大于自由、伦理重于法律、精英统治胜过民主和人权”。[1] 批评者担心，在这样一个大一统的天下秩序下，不同政治主张和多元价值不可能并存。依此，《天下体系》被解读为既勾画了一个长期的乌托邦的想象图景，又呼应了主张中国对外战略应将世界一致化的一种想法；在这些批评者看来，仿佛天下观原来是为中国重建世界帝国做理论铺垫。[2]

为“天下观”作现代诠释大非易事。

为“天下观”作现代诠释大非易事。“天下”含义中究竟有没有可能创造性转化为现代概念的要素，借以借古开今呢？《天下体系》一书中的论证虽然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但一味借口其意在建立新的大中华帝国而将所有讨论全盘否定则未免武断。首先，儒家“天道”和“人道”的价值观所规定的行为规范与现代国际规范并非不兼容。支持《天下体系》主要观点的学者认为，“天下”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世界秩序的一元论（monism）和整全观（holistic approach），这与现在西方主流的国际事务相互竞争的模式形成对照。[3] 上海哲学家童世骏教授肯定赵汀阳的天下理论强调“世界”优先于“民族国家”，认为这映射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全球化时代日趋过时的现象。其次，赵的“天下”观将非功利主义的对人类的责任（即罗尔斯意义上的“自然责任”）置于现实主义的制度性义务之上，“天下”所指为“仁”与“义”，是一套价值体系，而非政治体系；童文认为，这些思想资源有助于全球化时代的政治哲学建构。[4]

当代思想者多有指认中国传统文化为可能启示解决后民族国家时代全球问题的思想资源。而“天下”如何可能成为一个普适概念，还有待讨论。对此，《天下体系》的哲学论证留出太多模糊空间。此外，该书论述现有世界秩序相关性时只是集中批评联合国机制，探讨很不充分。[5] 而以华夷等级秩序观替代现有联合国框架下的世界秩序观并不足取也不可行。持大历史观的学者可能认为，现有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会和中国古代天下等级秩序一样，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都只

1 William Callahan, “Chinese Visions of World Order: Post-hegemonic or a New Hegemony?”.

2 Ibid.

3 [法]乐比雄：“在时间与历史中寻找跨文化秩序——对赵汀阳《天下体系》的一些评论”，陆丁译，载《世界哲学》，2008年第6期，第98—109页。

4 Tong Shijun, “Chinese Thought and Dialogical Universalism,” in Gerard Delanty, ed., *Europe and Asia beyond East and West*, Routledge, 2006.

5 参见上引乐比雄文。对《天下体系》哲学论证的批评超出本文范围，另见作者课题“Contending Conceptions of World Order and 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似跳丸日月，如白驹过隙的瞬息而已。[1] 但是，问题不在于全球化是否会将人类带回上古时代的无我无外之一元大同。问题的关键是，解读“天下”概念的当下相关性，其最大困难在于：如何可能将“天下”这样一个关系性结构作为思考基础，来与以个人主义为旨归和基石的思维方式争夺空间？《天下秩序》未能揭示这一点。可见，从中国传统哲学提取思想元素必须立足当代，而通古今之异、察中西之别还仅仅是基础功夫。

如何可能将“天下”这样一个关系性结构作为思考基础，来与以个人主义为旨归和基石的思维方式争夺空间？

结 语

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其持续发展是否会引发霸权转移的猛烈震动？这是中西知识界都非常关心的问题。美国学者埃肯伯里写道：由于中国面临的国际秩序与过去新兴大国遭遇的国际秩序根本不同，因而即使美国向中国权力转移，其情形也会跟过去很不相同。中国不仅面临美国，它还面对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体制，这个体制开放、完整、按规则行事，而且具备深厚的政治基础。今天的西方秩序难毁而易人。[2] 埃肯伯里认为，只要美国致力于巩固西方主导的现有世界秩序，继续鼓励参与、接触、融入和遏制，就能保持在其中的领导地位。[3] 他还说，面对21世纪中国的挑战，假如美国单枪匹马，那么中国得利；假如美国身后站着一个西方主导的秩序，那么赢家就是西方。[4] 西方对决中国，这显然是“天下观”所极力反对的二元论了；更要成了“挑战论”支持者希望逆转乾坤的战场。但谁胜谁负，谁主沉浮，并不是一场硝烟之后的战果。大国关系是长期持久的博弈，既不能赤膊上阵，也不能闭上双目遥想上古。新兴大国如何定位，需要有勇气直面问题：目前新兴大国中真有任何一国之实力能够抗衡美国吗？可预见的情形是不是新兴大国共同成长为世界秩序中具有决定影响的力量？无论如何，全球化时代相互依存加深的各国有一个共识：人类面临很多共同挑战，从气候变暖、能源危机、核扩散，到反恐与维和，乃至颇具争议的伊拉克、阿富汗、北朝鲜和利比亚问题，这些复杂事务与事件，需要国际社会达成共识，协作解决。

作为现有国际制度维护者的西方大国和要求参与全球治理的金砖五国，同样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中国过去30年以来创造的经济奇迹及其持续的经济活力和越来越自信强势的国际立场，以及2008年波及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和

1 Benjamin Schartz,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in Zheng Yongnian, ed.,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hinese View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Wang Gungwu*, Routledge, 2010.

2 Ikenberry, *op. cit.*, p. 24.

3 Ikenberry *op. cit.*, p. 34.

4 Ikenberry *op. cit.*, p.25.

西方陷入的种种社会经济困境，迫使知识界反省甚至质疑以欧洲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的治理模式和市场经济及其增长方式能否长期持续。虽然中国知识界对所谓中国模式并无定论，西方对中国发展的经验与问题的评论，却反映一些学者正借此深入思考一些政治学和经济理论的根本问题。最近中东北非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斗争和抗议风潮引发流血甚至武装冲突，特别是利比亚，初期西方大国在道义上的高调支持与行动上的迟迟无所作为形成反差，反映出国际社会在包括使用武力、人道主义干预及跨国保护责任（R2P，或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围绕联合国1973号决议的争议根源，在于美、英、法主张国际社会以保护人权的名义（和责任）在利比亚设立军事禁飞区，实际指向以武力干涉实现政权变革，而德、俄、中等国反对使用武力，质疑盟国以联合国名义使用武力的正当性，并担心盟国军事介入可能导致利比亚内战或内乱持续的后果。这些现象说明，世界秩序并非一个静止和停滞的给定状态，而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政治哲学的一些核心概念，比如民主、人权、自由、平等，以及帝国、干预、全球化等带有明显西方印记的概念，其普适性并未受到明确挑战，但是它们的内涵和语义却可能因为受到质疑而不断转变。跨文化的观念研究无疑有益于分享互惠知识，中国的、印度的、南非的、阿拉伯和非洲的秩序观都可能开启新的批判视角，质疑或者扩展普适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世界秩序并非一个静止和停滞的给定状态，而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

21世纪的世界格局，无论是以两极或多极为基础的均势结构，以国际事务区域化为特点的无极态势，还是可能兴起欧洲协同式的联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西方新兴国家的实力、价值体系及其对外战略。关键问题是：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全新的模式来完全替代现有国际秩序吗？或者，我们能够把西方秩序看做普适秩序的标准模式吗？假如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更合理的是不是思考另一个相关的问题：现有秩序在多大程度上可能作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稳定开放的核心，而这个核心必须逐渐扩大、包容和支持新兴大国的要求并接纳其实力和价值的贡献？

适合中国国家目标和国际大势的世界秩序观和战略构想之成熟，是一个任重道远的动态过程，不仅要审时度势，明辨国际实力对比，又要充分理解国际社会关于世界秩序的主流思想，才能是非分明，判断准确，中肯分析国际趋势，理性设计政策。此外，适合中国国情和国际趋势的21世纪大国战略，还需要普适性哲学和打通中西的政治学理论做支持，方能在国际社会赢得话语权和道义支持。

适合中国国家目标和国际大势的世界秩序观和战略构想之成熟，是一个任重道远的动态过程。